

東亞文明研究叢書 44

中國教育史 英文著作評介

李弘祺◎編

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東亞文明研究叢書 44

中國教育史

英文著作評介

李弘祺◎編

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編者序

台大東亞文明研究中心成立以來就積極推動東亞儒學和教育的研究，我個人能參與這兩個主題的各種研究計劃，十分高興。這本書是中心下面東亞教育研究室的一個成果。它收集了 21 篇書評論文，評介近三十年來英語世界（主要是美國）出版有關中國教育史的著作。每一篇大約有一萬字左右，處理一本相關著作。各篇文字除了介紹書的內容之外，也多少附有評論，期能讓讀者了解近年來美國對中國傳統及近代教育史的研究方向和成果。執筆的人主要是臺灣（臺灣大學和政治大學）和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及威斯康辛大學）的研究生，另外有部分是在 2003 及 2004 年選修我在台大歷史系開的〈英文中國教育史名著選讀〉的學生所寫。這也算是我回來台大工作的部份成果。

我另外寫了一篇導論，主要是因為評介 21 本書實在不足於讓讀者真正窺見當前學術的全貌，也無法取得一個比較公正、持平的看法。我的導論因此寫得比較長，一則作為閱讀這些論文的背景知識，一則作為全盤的介紹，幫助讀者把握近三、四十年來英語世界對中國教育、思想的研究情形。通讀這篇文章，讀者或許可以對本書所處理的各樣問題獲得相對客觀的了解和心得。

我借這個機會感謝編撰過程中曾經幫助我的許多人：高明士、黃昶立、唐郁評、嚴茹蕙、盧佳慧、王濬、蔡欣迪等人。這本書沒有編印引得，略感可惜，但是本書是評介集，每一篇文章都有一定的主題，不是資料集，因此沒有引得也不會太不方便，希望讀者諒解。

李弘祺

2005 年中秋前夕

中國教育史英文著作評介

目次

編者序.....	i
導論：英文有關中國教育史研究概述.....	李弘祺 1
讀《孔子以前——中國經典的創立》 (<i>Before Confucius: Studies in the Creation of the Chinese Classics</i>)...孫立天	55
戴梅可論主宰中國的《儒學五經》 (<i>The Five Confucian Classics</i>).....	黃昶立 75
中國的兒童觀 (<i>Chinese Views of Childhood</i>).....	林淑芬 95
述評賈志揚，《宋代科舉》 (<i>The Thorny Gate of Learning in Sung China: A Social History of Examination</i>).....	宋仁正 111
為有源頭活水來——讀《成型階段的宋儒教育》 (<i>Neo-Confucian Education, the Formative Stage</i>).....	孫立天 131
內闈：宋代的婚姻和婦女生活 (<i>The Inner Quarters, Marriage and the Lives of Chinese Women in the Sung Period</i>).....	龔元之 159

- 評韓明士論宋代江西撫州的士人階層 (*Statesmen and Gentlemen: The Elite of Fu-chou, Chiang-Hsi,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蔡惠如 179
- 略論《南宋書院與社會》 (*Academies and Society in Southern Sung China*).....王丹儒 209
- 讀《明代書院——歷史散論》 (*Academies in Ming China: A Historical Essay*).....孫立天 223
- 中國科舉制度的歷史意義及解釋：從艾爾曼對明清考試制度的研究談起 (*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李弘祺 239
- 中國近代早期的印刷文化——評《近世中國的出版事業，文化與權力》 (*Publishing, Culture, 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翁健鐘 259
- 閱讀中國明清時代的插圖小說 (*Reading Illustrated Fic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張碧君 281
- 清代教育和大眾識字：二十年後讀清代教育和大眾識字：二十年後讀 Evelyn S. Rawski 之著作 (*Education and Popular Literacy in Ch'ing China*).....許齊雄 297

略論包筠雅(Cynthia J. Brokaw)對功過格的研究 (*The Ledgers of Merit and Demerit, Social Change and Moral Ord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翁健鐘 319

探索思想史的新方法：讀《晚明思想中的「行」：呂坤和其他士大夫的重新定向》 (*Action in Late Ming Thought: The Reorientation of Lü-K'un and Other Scholar-Officials*).....許齊雄 337

讀《中國教育與社會變遷，近代的開始》 (*Education and Social Change in China: the Beginnings of the Modern Era*).....張堇珮 359

中國二十世紀初之教育改革 (*Educational Reform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a*).....潘佳慧 375

教育之普及於中國現代化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與意義——保羅貝利《改造老百姓》一書之探討與評述 (*Reform the People: Changing Attitudes towards Popular Education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a*).....黃馨瑩 399

中國百年來(1895-1995)現代大學的建構：從許美德對中國現代大學的研究談起 (*China's Universities, 1895-1995: a Century of Cultural Conflict*).....黃昶立 413

疏離的學院：1919 年至 1937 年民國時期的文化與政治 (<i>Alienated Academy: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Republican China, 1931-1937</i>).....	黃昶立 441
改革開放與中國的大學 (<i>China's Universities and the Open Door</i>).....	黃昶立 461

導論：英文有關中國教育史研究概述

李弘祺

中國教育史，在美國或整個西方，嚴格言之，並沒有人專門作這方面的研究。但是關於儒家思想對人格養成的影響，特別是中國在現代化歷程中所遭遇的困窘，那麼這方面的研究便曾經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部門。推廣言之，魏晉南北朝時代佛教對中國社會生活及價值的影響就有重要的教育意義。相同地，明代中葉以後，思想上及經濟上的變化，對中國地方社會的結構造成很大的衝擊，近世中國人的權威（或稱威權）人格逐漸形成，與這一段歷史中新生的許多民間組織以及它們所鼓吹的信仰有密切的關係。也因此就對中國教育的發展有了相互為用的意義。從這個角度言之，中國教育史一個重要的一環便是學習、研究民間的生活史、看他們如何塑造了中國老百姓的人格。在這個角度上看中國人的教育時，那麼很多研究就與教育史有關了。

教育史的研究因此和文化史、思想史、甚至於社會、經濟史都有密切的關係。但是過去研究教育史的學者重視的是制度史，因此，受那種訓練的學者便很難感受或了解為什麼一般通史在教育史的研究裏有其意義或重要性。狹義的教育史研究，重視的是國家教育機構的形成及其演變，重心放在描繪制度的內容及因襲過程，討論個別教育思想家的思想內

容。他們另外或許也做一些統計，來襯托教育實踐的成敗、良窳，其他大致就不再多所置喙了。教育史的研究當然不能只限於這樣的眼光。要討論美國研究中國的學者對中國傳統教育的認識，那麼我們就不能不把視野放大，看看他們從社會史、經濟史等的角度所談到的中國人人格養成的特色、社會控制的運作、價值理念的形成、以及考試制度的形成既影響等等的課題和研究成果。

科舉考試制度是中國教育史上一個特別重要的特點。它是人類歷史上一個很難見到的、持續悠久的政治制度。更重要的是它深深地影響了中國的社會和教育。對科舉制度，西方人一向就感到十分興趣，因此關於科舉制度的報導、描述、以及正式的研究，汗牛充棟。一般言之，研究中國科舉歷史的學者，一般都會注意到它們如何支配了中國的教育發展，至少會交待科舉制度的推動和教育制度之間的依違關係。因此，一本研究中國科舉制度的書，一定也有教育史的意義。我這篇概述就從近五十年來美國學界對中國科舉的研究開始。

一、 科舉考試與社會流動

近一個世紀以來，社會流動的研究成了許多社會學研究的重心。大約在 1950 年代，已經開始有學者把「社會流動」的觀念介紹到中國研究。最早的應推以水利灌溉社會理論而發展出東方專制(oriental despotism)學說的魏佛吉(Karl A. Wittfogel)。他早年以研究遼朝歷史而有名於世。他寫有一篇

有關遼朝考試制度的文章，¹主張遼的考試制度只是為了應付漢人的需求而設的，重要的官職還是保留給遼的士族，因此考試在遼的社會裏沒有什麼意義。

魏佛吉提出這個說法的同時，柯睿格(Edward A. Kracke)也提出了一篇重要的、研究宋朝社會流動的文章。²他分析宋代僅存於世的兩份〈登科錄〉(1145 及 1256)，看登科士人的家庭背景，發現大部分的人的父親，祖父和曾祖父三代都未曾當官。因此柯睿格結論說宋代的社會基本上還是提供了很多的上升的機會。柯睿格這篇文章的影響力大大地勝過魏佛吉，奠定了中國考試制度基本上是公平而開放的看法。³

柯睿格的結論於兩年後得到了許烺光進一步的支持。⁴許烺光是人類學者，他利用四個縣志上的人物材料，設計一個社會流動的標準，結論說中國平民要在社會階梯往上升，基本上還是有相當的機會。於是從另一個角度證明了柯睿格的說法。

¹ Karl A. Wittfogel, "Public Office in the Liao Dynasty and the Chinese Examination System,"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10 (1947).

² Edward A. Kracke, Jr., "Family vs. Merit in the Chines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during the Empir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10 (1947). 我在七零年代寫成的〈公正、平等、與開放〉對這段公案有所討論。見本人的《宋代科舉散論》(臺北：東昇，1980)。

³ 同一年(1947)，「社會流動」這個名詞也開始在中國出現。潘光旦與費孝通寫了一篇〈科舉與社會流動〉的文章，登在《社會科學》的第四卷。這裡不討論這篇文章。

⁴ Francis L. K. Hsu, "Social Mobility in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XIV (1949).

我在這裡特別提到許烺光這篇已經被人淡忘的文章，主要是因為他對什麼是社會流動有他特別的看法。雖然他也是拿父祖三代有否任官作為上升與否的標準，但是他把研究的範圍從父祖三代推廣到兄弟、叔姪，這就加大了討論的指涉。這一點非常重要。下面要談到的郝若貝(Robert Hartwell)就是這麼做，而享大名。⁵但是這樣的想法在許烺光已經開始了。另外一點，我認為也有相當的重要性的，就是他強調研究向下的流動(downward mobility)。這一點有一定的重要性，因為如果一個社會整體的向下流動大於向上的流動，那麼這就表示這個社會的資源的分配趨於減少，個人越來越困難上升。事實上，宋元以降，中國科舉考試所建造的官場就是一個有大量向下流動的社會舞臺。

許烺光的研究沒有引起特別大的注意。但是柯睿格的研究就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他的論文可以說是二次大戰之後一篇相當重要的、有關中國社會的文章。其實，柯睿格的方法相當平庸、沒有什麼特別出眾的地方。這篇文章會繼續引起人們的注意，主要是因為他的方法和結論後來在何炳棣的《明清社會史論》(*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得

⁵ Denis Twitchett 在一篇 1965 年的演講裏，就提議應該重視中國人的宗族組織，他認為雖然核心家庭未必能代代產生官員，但是只要同一個家族能這麼做，那麼這個家族就能繼續擁有社會優秀份子的地位。當時他對「家族」的定義並未提出來，恐怕也還不甚了了。他的演講辭題為：“A Critique of Some Recent Studies of Modern Chinese Social-Economic History”，登於 *Transact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Orientalists in Japan*, vol. 10 (1965)。按，這篇文章我曾經翻譯為中文，登在 1975 年的《思與言》。

到了更為全面的驗證和確認，遂奠定了中國社會或至少考試是開放的這個重要說法。⁶

在討論何炳棣那本非常重要的書之前，應該先提一下張仲禮。他於 1955 年出版了《中國士紳：在十九世紀中國社會的角色》。⁷這本書的內容主要是在討論什麼是中國清代的士紳(gentry)。他認為「士紳」簡單地說，就是科舉有名位的人。這樣的定義簡單而明瞭：科舉的「名位」可以從生員算起，就是所謂的秀才，也就是已經通過學校考試、可以入學的人。張仲禮進一步研究中國士紳的收入，指出考試制度實際上不能真的錄取有才能的人，而個人的財富往往是決定他能不能考試出身的重要因素。張仲禮稱生員為「下層士紳」。

何炳棣的書出版于 1962 年，主要是討論社會流動，因此不是寫來批評張仲禮的，但是為了讓所謂的「士紳」階級有了更為明確的定義，他指出張仲禮把生員列為「士紳」階級的缺點，而主張「生員」的社會地位很低，不應列入「士紳」階級。

何炳棣的書利用明清兩代的登科錄，統計中舉士人的家世。他和柯睿格一樣，利用登科錄裏父祖三代的記錄來統計中舉士人的出身。他發現明代一般來說，考試還算公正，也

⁶ Ping-ti Ho,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2).

⁷ Chung-li Chang, *The Chinese Gentry: Studies on Their Role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ese Societ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55).

因此稱得上相當開放。但是清代以後，這種開放的情形就逐漸受了破壞，因為大量買官，所以考試的公平受了挑戰，逐漸失去它開放給貧寒士子的特色。

何炳棣的書，嚴格言之，在方法上面並沒有超過柯睿格，只是做了更全面，更大規模的統計。在定義「士紳」的標準上面，他也沒有提出新的看法。⁸但是由於他用的材料相當的多，處理十分嚴謹，所以這本書洛陽紙貴，影響了一整代的學者。但是書中所作的一個過分推論的偏失：即中國社會因此是開放的，現在他自己也已經承認是不對的。

如上所述，從許烺光開始，已經有人注意到父祖三代的算法，失之過嚴，因為一個人即使父祖三代沒有人仕官，也仍然有可能是有錢家庭或家族的子弟，把他們通通算是貧寒出身，這樣並不可靠。他的書出版後不久，**Denis Twitchett** 就提出了批評（看注 5），主張必須重視家族的重要性。家族當然是比父系三代遠為寬鬆的一個測量的標準。如果採用家族作為標準，那麼很多表面上看似貧寒出身的中舉士人恐怕還是從有錢有地位的家族來的。不過什麼是一個「家族」，這又是一個惱人的問題。一直要到 1979 年，他的學生 **Hilary Beattie** 出版了有關桐城張氏家族的研究，⁹這才算是提出了受到人類學影響的初步看法。簡單地說，**Beattie** 認為有族譜相連，互相能濟助的親人，算是一個宗族。這個看法與一般中國史家的看法還算一致。雖然 **Beattie** 不強調族人必須住得很

⁸ 不知道為什麼沒有認真地看待許烺光的意見。

⁹ **Hilary Beattie**, *Land and Property in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相近，也沒有特別強調祖產、宗祠的重要性，但是對後來學者的研究方法已經起了啟發性的影響。她又強調宗族在教育上的重要性。可以想像她是認為參加科舉考試，如果要成功的話，那麼，多少會依賴宗族的幫助。

Twitchett 和 Beattie 試圖的看法算是對合併地的一種批評，但是真正對何氏提出系統的批判的應當說是 Robert Hartwell。他在 1982 年發表了一篇很多人引用的文章。這篇文章分成兩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討論唐宋以來，中國人口向南遷徙的情形，探討這個現象的意義。簡單地說，他的意義就是就是南方的崛起。文章的第二部分提出了一個重要的論點：認為中國人的家族（他使用 *lineage* 這個字）十分重要。如果採用一個人的家族作為研究的對象，來加以統計，那麼便會得到這樣的結論：全國是由很少數的一些大家族壟斷了上升的機會。在真宗至神宗的八十七年間，重要官職中有四分之一由三十五個大家族所霸佔。

Hartwell 的說法不僅否定了考試制度能「根本消融社會階級....（讓）人民優秀分子均有參政機會」，¹⁰甚至於根本主張說，宋代由考試所促成的社會流動很小。¹¹他的學生韓明士

¹⁰ 這裡引用的是錢穆的說法，見《國史大綱》（臺北：商務，1960），292。不過，錢穆這裡說的是參政權是向所謂的「優秀分子」開放的。只是他的「優秀分子」和 Hartwell 所說的大家族子弟是不同的。

¹¹ Hartwell 另外提出究竟宋代的所謂優秀份子是不是從唐代的貴（世家大姓）遺存或接續下來的問題，我在別的地方另有介紹及討論，這裡不再觸及。請參看《宋代官學教育與科舉》（臺北：聯經，1993），〈中譯本序〉。這篇序對 Hymes、下面要提到的

(Robert Hymes)乾脆認為流動量為零。Hymes 的書由於影響很大，又得了獎，所以必須加以介紹，雖說它的論旨基本上只是由 Hartwell 的說法繼續發揚而得。

Hymes 研究的是江西撫州的地方及家族歷史，他認為南宋以後，中國社會有「地方化」的現象，中國士紳階級的興起和這個現象互為表裏。他進一步討論撫州地方的家族，認為他們的延續力很強，互相通婚，而社交的圈子也明顯地限於同階級的人。若把這個圈子當作是一個人的「出身背景」或說「環境」，那麼，宋代中舉的士人恐怕都是由這圈子裏出來的人所壟斷，社會流動因此根本不存在。¹²

Hartwell 與 Hymes 的說法可以說正與二十年前何炳棣的說法完全相反。我們不免要懷疑：那麼科舉考試的意義何在？坦白說，這一點兩位都沒有清楚的交代。這是因為兩位師生的關心是在於社會階層的組成和結構，而不在科舉制度的社會意義。

兩位的說法雖然引起了注意，廣為引用，但是並不是所有的人都贊成他們的看法。例如戴仁柱(Richard Davis)在他研究明州史嵩之和史彌遠一族的書中便提出相反的看法。戴書

Davis，以及賈志揚等人的觀點也有比這裡更為詳盡的介紹。另外，我在《宋代社會與家庭：評三本最近出版的宋史著作》的書評論文中對 Hartwell 的論點也有比較詳細的介紹。該文登在《清華學報》，新 19 卷（1989），第一期。

¹² Robert Hymes, *Statesmen and Gentlemen: The Elite of Fu-chou, Chiang-hsi,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這本書我寫有英文書評，登於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 109, no. 3 (1989), pp. 494-497.

不是為了批判 Hartwell 及 Hymes 寫的，中心題旨也不是社會史，因此不能說在我們關心的議題上面有什麼真正的意義。但是他至少認為考試的成功與否對一個家庭或宗族的生命力有密切的關係。¹³另一位學者 Beverly Bossler 在研究宋代的家族史的書裏，便支持了戴仁柱的說法。不過 Bossler 的書因為也不專門討論考試制度，因此我就不在這裡多廢筆墨。¹⁴

對宋代考試制度的研究，允以賈志揚(John W. Chaffee)的《宋代科舉》為最重要。¹⁵他對 Hartwell 的結論表示了一些保留。¹⁶但是沒有像戴仁柱或 Bossler 一樣，因為家族的延續必須依靠考試來支持。這主要也是因為他並沒有系統研究家族的活動，以及家族保護自己的策略。

¹³ Richard L. Davis, *Court and Family in Sung China, 960-1279*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5). 這本書我另外寫有英文書評，登於 *Journal of Asian History*, vol. 21, no. 1 (1987), pp. 91-92.

¹⁴ Beverly J. Bossler, *Powerful Relations: Kinship, Status, and the State in Sung China (960-1279)* (Cambridge: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98). 這裡必須提到陶晉生教授的近著：《北宋士族，家庭、婚姻，生活》（臺北：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專刊，2001）。陶氏的書雖以中文寫成，但是與最近美國的學術趨勢，相互呼應，其結論有調和兩邊說法的意味。

¹⁵ John W. Chaffee, *The Thorny Gate of Learning in Sung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此書由我推薦，有中譯本。由臺北的東大出版（1995）。又，賈志揚的書於 1995 年出版修訂本（基本上是再版），我寫有書評，登於 *China Quarterly*, vol. 35 (1997), pp. 1378-79.

¹⁶ 當時 Hymes 的書還沒有出版。